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62

2009年11月18日

失去的機遇？

— 赫魯曉夫下臺後中蘇兩黨和解的新嘗試

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 李丹慧¹

1964年，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論戰的展開，國際共運中幾乎所有的黨裡都有毛澤東的追隨者。由於毛澤東在處理黨際關係時，主要是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的左派聯合，依靠左派黨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支持各國的革命鬥爭，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實際已成為另一個政治中心。加之左派隊伍不斷壯大，初具陣營的規模，國際共運由此呈現出分裂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其實已下定了另立門戶的決心。對他來說，既然蘇共是修正主義政黨，世界上多數共產黨也都已經變修，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同流合污了，那麼國際共運的內涵實際也已發生變化，中國黨應

¹ 本文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8期，發表時有刪節 — 作者註。

該轉而率領左派黨支持亞非拉國家的反帝革命鬥爭，開闢國際共運的新天地，確立起中共作為世界革命領袖的地位。以此，正式向赫魯曉夫對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提出挑戰，並且要將分裂的責任推給蘇共承擔，只是時機的選擇問題了。

正當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召開兄弟黨會議問題上的爭執陷於僵局時，克里姆林宮發生權力更迭，蘇共中央十月全會解除了赫魯曉夫黨和政府領導人的職務，由勃列日涅夫就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柯西金出任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的下臺，似乎給中蘇關係的和解帶來了新的機遇。但是事實上，中蘇兩黨在對緩和雙方關係的評估中，仍然繼續堅持認為自己的立場代表了馬列主義的原則基礎，與此相應，雙方和解的基礎實際也依舊是各自的原則立場。差距只在於雙方尋求和解的目標有所不同：蘇方以為導致與中國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是赫魯曉夫的個人品質，蘇共搬開了這塊絆腳石，蘇中關係的改善即應大有希望，蘇共接受求同存異的團結方式。此為一種務實的和解方針。中方則認為赫魯曉夫的下臺是中共意識形態鬥爭的勝利，蘇共有可能糾正赫魯曉夫的錯誤，向中共的軌道靠攏。對於毛澤東來說，在國內經濟和國際共運的環境均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實現中蘇和解的底線已不是求同存異，而是蘇共新領導集團改弦更張向中共的正確路線綱領趨同。毛澤東要借赫魯曉夫下臺之機，徹底清除蘇共的“命根子”——二十大在國際共運中的法定地位，² 扭轉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被動局面，使世界革命黨的鬥爭能夠順利地沿著中共的路線發展。畢竟中共在兩次莫斯科會議上做出的實質性讓步，導致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國際大會肯定蘇共一黨的會議，並將對二十大的高度評價寫入會議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聲明之中，造成了赫魯曉夫的思想體

² 中共在 1960 年代初時即已認為蘇共把二十大當作了自己的命根子（〈新情況（1961 年 10 月 19 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3043-01，第 6 頁）。

系成為國際共運共同準則的事實，從而令中共在與蘇共的競爭中陷入了受羈絆的被動境地。這實際是一種建立在干涉他黨內部事務基礎上的團結訴求。因此，就毛澤東而言，與其說是嘗試尋求與蘇共達成新的和解，不如說是要為中共繼續沿著傳統的國際共運軌道前進做最後的努力。即，如果蘇共新領導人能夠改弦更張，國際共運能以中共的路線綱領為指導，則中共將留在國際共運內，引領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沿著毛認為的正確路線前進，否則中共將退出國際共運，另起爐灶，領導世界革命運動。

過去，對於赫魯曉夫下臺後周恩來赴莫斯科與蘇共新領導人進行接觸及會談的過程，囿於材料缺乏，尚無系統、客觀地考察和評說；中國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材料和文章，一些細節也多有出入或模糊不詳；³ 國外兩部關於中蘇關係的最新研究著作，⁴ 在考察這一問題時，基本依據的是俄國檔案，而較少利用中國的第一手材料。筆者將以中國檔案，特別是外交部最新解密檔案文件，以及俄國新解密檔案為史料基礎，對蘇聯領導集團更迭後毛澤東尋求與蘇方接觸的目的，中蘇雙方為實現新的團結啟動會談的方針立場，其間發生的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以及中蘇兩黨能否把握這次和解機遇等問題，進行考察和客觀評估。

³ 1997年10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項目、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在北京聯合舉辦了“冷戰與中蘇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邀請了中俄雙方當年曾作為翻譯參與中蘇兩國領導人會談的當事人。其中參加1964年11月周恩來與蘇聯新領導人會談的中俄歷史見證人，對於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等一些細節的回憶有出入，令人困惑。目前，隨著俄國和中國外交部檔案的相繼解密，我們可以基本還原歷史了。

⁴ Lorenz M. Luthi : *The Sino-Soviet Split :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ergey Radchenko :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一、蘇共新領導集團執政伊始的基本立場及變化動向

1964年10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決定解除赫魯曉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但是這種最高權力的更迭，並不意味著蘇共路線方針，尤其是對外政策也隨即轉型。蘇共新領導人迅速擺出了按既定方針辦的姿態，只是在一些提法和做法上，也陸續顯露出了一些不同於以往的似乎是向左轉的跡象。

1、確定維護蘇共以往路線綱領的基本立場

10月14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的全會公報即已明確提出，“世界上任何一個黨都沒有我們這樣一條富於經驗而又可靠的對外政策路線”，蘇共“現在和今後都堅定地站在列寧主義立場上，捍衛黨的綱領、蘇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決議”。關於赫魯曉夫的錯誤，全會批判的重點在其國內政策、工作作風及搞新的個人迷信上。至於外交方針，赫魯曉夫的失誤僅在於“實行時採取的方法和行動不妥當”，諸如在蘇伊士運河、柏林、古巴問題上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導致危機的發生；即便指出赫魯曉夫“只要蘇聯和美國談妥，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的口號是錯誤的，其著眼點也是這一口號忽視了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沒有執行利用西方陣營中的爭吵與矛盾，削弱美國地位的任務。

在總結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維護國際共運的團結問題時，蘇共新領導集團也並無原則性的檢討，以及對中共做出實質性讓步的意思。報告仍然將國際共運分裂的前景歸咎於中共，指出，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分裂危險的主要原因，是滑向大國民族主義和新托洛茨基主義立場的中國領導人進行的破壞活動”，赫魯曉夫的過錯只在於其“同兄弟國家領導人談話時，表現粗暴，缺乏涵養，高傲自大，語出傷人”。赫魯曉夫的个人品質及任性做法不啻

於是授“中國分裂主義者”以柄，使之藉以分化拉攏一些黨派組成了自己的陣營。為此，“在同中國領導人的錯誤進行鬥爭”時，蘇共首先是“不能放棄原則性立場”，其次是在此基礎上，“理智地、更明確地、更細緻地實行同所有共產黨合作的列寧主義政策”。⁵

十月全會甫一結束，蘇共中央即在向中共方面通報赫魯曉夫下臺的消息時，明確表述了自己的基本立場。10月16日零時5分至30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受蘇共中央委託，緊急約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遞交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通知。該通知不僅強調了蘇共路線綱領的無變化，而且還特別指出，蘇共今後要為國際共運的一致性而鬥爭。伍修權表示將儘快轉告中共中央。⁶

繼之，為穩定國內政局，蘇共中央著手統一全黨及全國的思想。一方面，在向各級黨組織傳達中央全會決議、說明赫魯曉夫錯誤的同

⁵ 〈蘇共中央主席團在蘇共中央十月全會上的報告〉（1964年10月14日），АПРФ，ф.2，оп.67，Пакет，№223，Подлинник. Вестник，1998，№2，с.101~125。中譯文引自閻明復：〈關於赫魯曉夫下臺的分析和解釋——當事人的回憶與俄國檔案文獻〉，《冷戰國際史研究》第五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第319~360頁。關於赫魯曉夫的口號“只要蘇聯和美國談妥，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中方的報道為“蘇美合作，主宰世界”。

⁶ 〈伍修權接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談話記錄〉（1964年10月16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3，第1~3頁；〈契爾沃年科與伍修權會談備忘錄〉（1964年10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憶周總理最後一次訪問蘇聯〉，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4~16頁。國內一些文獻將這次會見的時間寫為1964年10月14日深夜或晚，應有誤（如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829~930頁；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258~259頁）。蘇共中央的通知中寫道：“蘇共中央全會一致強調指出，蘇共今後仍將堅持不渝地遵循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決議和我黨的綱領，將堅定地在莫斯科宣言和聲明的基礎上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致和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而鬥爭”（〈蘇共中央關於解除赫魯曉夫黨內外職務給中共中央的通知（1964年10月16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3，第3頁）。

時，突出強調以往蘇共總路線的正確性，強調蘇聯對外政策的正確性。⁷ 一方面，通過黨報和公開講話，宣佈蘇共中央的立場。《真理報》10月17日、19日、21日連續發表社論，闡述蘇共新領導集團的內外政策，一再宣稱蘇聯的內政外交政策不變，強調蘇聯的由馬列主義思想光輝照耀著的道路，是由蘇共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集體制定的總路線和蘇共綱領確定的”，蘇共將繼續執行這條總路線和總綱領；11月1日又以〈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偉大旗幟〉為題發表編輯部文章，進一步闡釋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綱的理論意義和政治意義，宣傳新黨綱所提出的“全民國家”的“科學結論”，宣稱蘇共將“永遠忠於在第二十次至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和蘇共綱領中制定的列寧主義總路線”。勃列日涅夫則於10月19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歡迎蘇聯“上昇號”宇宙飛船宇航員的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說：“我們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制定的我們黨的總路線是列寧主義的路線。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整個對內對外政策的惟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蘇聯對外政策不可動搖的基礎是：列寧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原則”，“這是在當前條件下惟一明智的政策。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們理解、贊同和支持這一政策”。⁸

⁷ 〈莫斯科市委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報：關於莫斯科市黨組織黨員積極分子會議〉（1964年10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7, с.271~273*；〈羅斯托夫州工農業黨組織積極分子討論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月（1964年）全體會議決議的會議速記記錄〉（1964年10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273~280*。

⁸ 《人民日報》1964年11月6日，第5版；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10月27日（藏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第3669號，第19~21頁；《新情況》特字第27號：〈赫魯曉夫下臺後蘇聯內外政策變化的動向〉（1964年10月23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1，第94頁；《人民日報》1964年10月30日，第3版。

2、一些方針政策顯露變化的新動向

不過，儘管蘇共中央表明了繼續執行以往路線方針的態度，但是與過去相比，對一些問題的提法和一些做法還是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其中關於對外政策、中蘇關係及國際共運問題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和平共處是外交政策總路線”的提法做出補充解釋。《真理報》10月17日社論在為蘇聯的外交總路線下定義時，除和平共處的原則外，還增加了“為和平和國際安全”而鬥爭的內容；闡釋說蘇聯“奉行和平政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作鬥爭”，從而“有助於各國人民為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進行順利的鬥爭。”

其二，強調帝國主義威脅和平，蘇聯要加強國防力量。柯西金10月19日在歡迎宇航員的招待會上發表的講話和《真理報》10月21日社論都提出，世界上仍然存在帝國主義勢力，它們使國際關係尖銳化，給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脅。蘇聯今後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強國防能力，保證蘇聯邊界的不受侵犯，保證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安全。世界各國人民要保持警惕，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的陰謀。

其三，提高反帝反殖、支援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調子。勃列日涅夫10月19日紅場講話和《真理報》10月21日社論均明確提出，蘇聯的國際職責、國際主義義務是全力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附庸，爭取社會和民族解放的正義鬥爭。同日，柯西金在歡迎宇航員招待會上的講話則強調說，蘇聯“將為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和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義、為所有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鬥爭”。

其四，對一些重大國際事件和重大外交措施，或者略而不提，或者改變提法。10月15日是美英蘇三國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生效一週年，但是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講話及《真理報》社論，

都隻字未提此條約；關於建立聯合國部隊的建議也未見提及；指責美國侵略古巴的活動威脅普遍安全和世界和平；警告美國不得侵犯越南主權；在蘇德友好條約簽訂以來首次重申盡速締結對德和約並在此基礎上變西柏林為非軍事化自由市的主張。

其五，雖然勃列日涅夫講話和《真理報》社論等繼續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運的一致性、蘇共將捍衛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強調社會主義各國和國際共運的團結，但是反華宣傳已基本停止。除 10 月 16 日蘇聯報紙曾轉載伊拉克共產黨的反華言論，17 日和 18 日《真理報》先後轉載法共、意共和伊（拉克）共的反華言論外，從 10 月 19 日起至月末，蘇聯各報已完全停止反華宣傳，不再刊登點名或明顯影射攻擊中共的言論，包括其他黨攻擊中共的材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19 日的講話未公開指名或影射攻擊中國；《真理報》19 日在次序較前的位置全文刊登了中國領導人給蘇聯新領導人的賀電；蘇聯中央各報在報道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消息時均未予以攻擊；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格里申 20 日在布達佩斯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未反華。

其六，儘管《真理報》10 月 17 日和 21 日社論，以及勃列日涅夫 19 日的講話都聲稱蘇共將一如既往地積極執行召開所有共產黨的國際會議的積極路線，強調參加會議的成員是“全世界各馬列主義政黨”，但都只是一般性地提及，而不提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具體時間。⁹

對於中國方面來說，上述這些變化似乎表明蘇共新領導人的大政方針中還含有某種不確定因素，其為中蘇關係的變化，勾勒出了某種

⁹ 文中六個方面，參見《人民日報》1964 年 11 月 6 日，第 5 版；《人民日報》1964 年 10 月 30 日，第 3 版；《內部參考》第 3669 號 1964 年 10 月 27 日，第 19-21 頁；《新情況》特字第 27 號：〈赫魯曉夫下臺後蘇聯內外政策變化的動向〉（1964 年 10 月 23 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1，第 94-97 頁；〈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4 年 10 月 29 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2，第 116 頁。

不確定的前景。

二、中蘇兩黨關於恢復雙方關係的新設想

毛澤東在已知蘇共表態不改變其路線綱領的情況下，依然決定暫停公開論戰，派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紀念活動，試探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按照他的話說就是，到莫斯科去進行火力偵察，看看對方的反應，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爭取蘇共新領導往好的方面變化”。這實際是一種不留餘地的尋求和解的方針，其重點在於摸清情況，而非進行實質性和解工作。在毛看來，停止論戰，舉著和好的旗幟到莫斯科去可以爭取人心，中共現在需要積累資本。出發點還是對國際共運領導權的關注。蘇共中央則對即將到來的與中共領導人進行面對面交流的新機會，充滿期待並寄予厚望。蘇共領導人希望雙方能夠更為理智和實際地調和兩黨之間的分歧，設想在不放棄自己原則立場的前提下，利用這一輪會談，務實地尋找共同點，力爭求同存異，達成新的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恢復雙方的關係。

1、毛澤東定下“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調。

對於赫魯曉夫下臺的消息，中共中央應該在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結束後即已獲悉情況。從10月15日起，毛澤東差不多每天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下臺的問題。根據中共領導人的分析，赫魯曉夫的被迫辭職應與中蘇兩黨的大論戰有關，中共發表的九評，揭露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的真面目，打中其要害，使之處於非常難堪的境地。蘇共中央十月全會的決定，不過是證實了毛澤東在3月份做出的赫魯曉夫可能要垮臺的預見。根據毛澤東的估計，蘇共新領導集團今後會有一些改變，但不會很快，也不會大幅度地變。變化的可能有三種：第一種是從修正主義變成馬克思列寧主

義，目前這種可能性小。第二種是變得比赫魯曉夫更壞，這種可能也不大。第三種則屬於中間狀態，即仍然搞修正主義路線，不過在做法和策略上有某些改變。這種可能性比較大。據此，毛澤東最初確定的方針是靜觀其變，“一肯二看”，即對蘇共中央解除赫魯曉夫職務的決定表示肯定和讚賞。¹⁰

10月16日子時契爾沃年科緊急約見伍修權、遞交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通知之後，伍修權即通過楊尚昆將此通知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是日清晨，中共中央辦公廳又向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做了通報。上午發行的《人民日報》則刊登了蘇方關於赫魯曉夫下臺的公報。¹¹ 儘管蘇共中央的通知已表明了蘇共將遵循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路線，也即維持赫魯曉夫原有方針不變的立場，毛澤東還是按照其“一肯而看”的方針，迅速做出指示，由毛、劉、朱、周聯名給蘇聯新領導人發賀電，表示對他們寄予希望，並指出，賀電要發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三個人，這不是一般禮節性的祝賀，而是在重要時刻發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要說一點有實質內容的話。據此，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負責起草的賀電提出，中共、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於偉大的蘇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每一個進展，都是高興的”，並“祝中蘇兩國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誼不斷發展”，表達了開展大論戰以來所沒有過的

¹⁰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33、836~839、841頁。另外，契爾沃年科10月16日向伍修權通報消息時，伍修權的表現給契爾沃年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國方面似乎在此之前便已通過某種渠道瞭解了他所要通報的實質性內容（〈契爾沃年科與伍修權會談備忘錄（1964年10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

¹¹ 〈伍修權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談話記錄〉（1964年10月16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3，第1~3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29~930頁（該記述的時間為“14日深夜”和“第二天一清早”，應有誤）；〈蘇共中央全體會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分別發表公報，赫魯曉夫下臺〉，《人民日報》1964年10月16日，第1版。

比較熱情、有所讚賞的態度。該賀電當日即遞交契爾沃年科，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於當晚播出，《人民日報》次日（17日）於頭版的位置予以發表。¹²

與蘇共停止反華相對應，中共從10月16日起也停止發表與蘇共論戰的文章，以及其他兄弟黨左派批判赫魯曉夫的文章；並通過一些公開場合的講話和與外賓的談話，表達準備主動與蘇聯改善關係的意向，擺出了一種按兵不動、對蘇友好的姿態。¹³

面對蘇共中央緊鑼密鼓地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以及其間顯露出的一些提法、做法有所變化的跡象，毛澤東在靜觀十天後，決定要採取行動了。10月27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部署說，可以考慮主動向蘇方提出派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的慶祝活動，並且打破常例，在此非逢五逢十的紀念日裡，派出由周恩來和賀龍為首的有分量的黨政代表團。我們現的方針應該是“一推二看”，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爭取蘇共新領導往好的方面轉變。¹⁴

根據這一方針，中共中央首先採取了三個步驟。

其一，主動向蘇方提出進行接觸的建議。10月28日晚，周恩來約見契爾沃年科，提出兩點建議：第一個提議是，中共有意派一個黨政代表團去蘇聯祝賀十月革命節，順便同蘇共黨政負責人進行接觸。

¹² 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第19~20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39頁；《人民日報》1964年10月17日，第1版。

¹³ 查1964年10月16日起至10月31日的《人民日報》，已無此類文章發表；〈契爾沃年科與周恩來會談紀要〉（1964年10月28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30~334*；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40頁。在談話紀要中，契爾沃年科向國內通報說，近日彭真在一個北京市委積極分子會議上提出中國領導人打算主動改變同蘇聯的關係，周恩來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也表述了此意思。經查，《人民日報》對於前者無報道，後者則只發佈了10月2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的簡短消息（《人民日報》1964年10月27日，第1版）。

¹⁴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41~842頁。

如果蘇方有困難，第二個提議是，中共歡迎蘇聯的負責同志到中國來，進行接觸，不論是公開的，還是不公開的，中方都歡迎。如果這兩個提議對蘇共來說都有困難，中共願意聽聽蘇共的建議。周恩來並談到，“為了達到團結，分歧要克服，關係要調整。所以我們要進行一些接觸。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¹⁵ 以此率先打破大論戰以來中蘇兩黨之間的僵局，為實現兩黨新的接觸提供了臺階。

其二，以緩和關係的姿態確定代表團的規格和團長人選。10月29日，周恩來再次接見蘇聯大使，進一步提出中共中央決定派以周恩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去蘇聯。¹⁶ 一方面明確了中國代表團的規格為黨中央副主席、政府總理一級；一方面示意蘇聯，代表團團長為其能夠接受的相對溫和務實的周恩來，而不是咄咄逼人的論戰鬥士鄧小平。

其三，率先提出邀請12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派代表赴莫斯科的建議，並在正式向蘇方提出此建議和對方尚未做出回應之前，先後向各黨通報消息。10月2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中共自己主動派重要代表團去還不夠，可考慮建議12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派代表團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節。他解釋說，我們一家去太孤單，由於過去一貫跟隨蘇共走的那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多數都希望蘇共維持原來的路線不變，所以，我們可以與越南、朝鮮、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駐中國的大使通氣。於是同日，周恩來先於接見契爾沃年科之前約見了越、羅、阿、古、朝五國駐華大使、臨時代辦，向他們通報其28日與蘇聯大使談話的內容，並介紹了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的進一步建議，即邀請12個社會主義國家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

¹⁵〈外交部、中聯部致潘自力電〉（1964年10月29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678-01，第5頁。

¹⁶〈中聯部、外交部致潘自力電〉（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678-01，第7~8頁；〈契爾沃年科與周恩來會談紀要〉（1964年10月28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30~334*。

週年慶祝活動，同時進行必要的接觸。囑他們可分別直接向蘇方提出去莫斯科的建議。即之，周恩來正式向契爾沃年科說明了中共的這個建議。10月30日，周恩來又接見保、匈、捷、波、蒙、德六國駐華大使，通報中方的提議，建議六國黨和政府提請蘇方邀請其派團去蘇。¹⁷ 亮出一種召集人的姿態，既向其他兄弟黨顯示中共是尋求改善中蘇關係的主動方，為樹立中共是國際共運團結維護者的形象做了鋪墊，又為改善中共在莫斯科勢單力薄的不利處境提供了條件。

在蘇共中央10月31日表示接受中共派團出訪莫斯科及邀請其他兄弟黨參加十月革命節慶典的提議後，11月1~4日，毛澤東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進一步闡釋了他的“一推二看”的方針，說明中國黨政代表團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現場觀察，看看蘇共可能往哪個方向走，這叫做火力偵察。中共舉著和好的旗幟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我們現在需要積累資本”。¹⁸ 毛澤東決策與蘇共新領導人進行接觸的方針進一步明朗化：其底線是已有的原則基礎不變，中共不會為緩和與蘇共的關係而做出原則性讓步，談判的基調是“推”蘇共向中共的立場趨同；方法為通過“推”進行摸底，觀察蘇共中央有無轉變立場的可能；目標則是爭取莫斯科改弦易轍，爭取人心，積累資本，將國際共運分裂的責任拋給蘇共，為取得共運領導權，或說是使國際共運沿著中共認為的正確道路發展做準備。

隨著十月革命節的臨近，中國方面開始加緊步伐落實毛澤東的這一方針，為實現既定目標做準備。

第一，渲染友好態度，為即將到來的莫斯科中蘇兩黨談判營造良

¹⁷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42~843頁；〈中聯部、外交部致潘自力電〉（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678-01，第7~8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81~682頁。

¹⁸ 〈中聯部、外交部致潘自力電〉（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678-03，第20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48~850頁。

好氛圍。10月31日，外交部禮賓司擬訂出兩套向蘇聯贈送禮品的方案，其中第一方案援例中國黨政代表團1957年和1960年赴蘇參加莫斯科會議時的禮品規格，贈送範圍大，從國家領導人到接待人員乃至招待人員皆有份，禮品的等級高份數多。外交部認為，為了更好地配合這次出訪工作和製造一些團結友好的氣氛，第一方案較好。第二方案的送禮規格則大大降低。外交部按第一方案備齊禮品，由代表團到莫斯科後視情況決定採用哪種方案。¹⁹ 11月5日，由毛劉朱周聯名致電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祝賀十月革命47週年。賀電強調中方真誠地希望中蘇兩黨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基礎上，緊密地團結起來。毛澤東並親筆加寫了“讓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我們的堅強團結面前發抖吧！”的口號。²⁰

第二，為周恩來的出訪造聲勢，打造中共高舉團結旗幟的形象。11月2日，外交部擬訂出為以周恩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送行的計劃，其規模大，共約一百餘人；規格高，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領銜送行。同日，外交部批准中國駐蘇使館擬訂的方案，即中國代表團抵莫斯科時通知所有建交國使館和一些平時有友好往來的未建交國使館。中國駐蘇使館將中國黨政代表團抵莫斯科的時間共通知了52個國家的使節，11月5日，當周恩來等人抵達莫斯科伏努科夫機場

¹⁹ 第一方案，國家領導人的甲級禮品28份，每份價值600~800元；有關部長的乙級禮品20份，每份價值200~300元；有關司局長和接待人員的丙級禮品一百份，每份價值50~100元；另備一百份贈送招待人員的禮品。各級禮品以實物為主，分為甲、乙、丙三等，包括瓷器茶具、檯布、衣料、名酒、茶葉、煙具、鋼筆、絲頭巾、檀香扇、手絹、半導體收音機、手錶等等。第二方案則只送副部長以下的陪同和接待人員以及招待人員，禮品等級和份數均相應減少，只有乙級15份，丁級一百份及招待人員一百份（〈外交部禮賓司關於周總理訪問蘇聯贈送禮品方案的請示（1964年10月31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2，第9~11頁）。中國黨政代表團最終採用了哪種方案送禮，目前筆者尚未看到相關的材料。

²⁰ 《人民日報》1964年11月7日，第1版；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54頁。

時，有 40 國的使節前往迎接，除東歐國家（不包括羅馬尼亞）及蒙古使節未到場外，絕大多數亞非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和未建交國家使節均到機場迎接。²¹

第三，集中報道兄弟黨對赫魯曉夫下臺一事的表態，突出顯示在召開國際會議問題上意見仍然不統一的狀況，預告舉行兄弟黨會議與分裂國際共運之間的責任歸屬問題。11 月 2~4 日，《人民日報》集中發表了 16 個兄弟黨就赫魯曉夫被解職及國際共運的發展問題所做的講話、聲明、決議、公報等等，其中日本、新西蘭、瑞典和荷蘭的共產黨或表示反對召開國際會議，或主張推遲，或認為要籌備國際會議，尚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²²

11 月 5 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啟程經新西伯利亞前往莫斯科。次日，當中國代表團對蘇聯黨政領導人進行禮節性拜訪、參加十月革命節慶典時，²³ 中共中央開始利用慶祝十月革命節之機，在

²¹ 〈外交部關於為以周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送行計劃的請示〉（1964 年 11 月 2 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3，第 1~4 頁；〈外交部致駐蘇使館電〉（1964 年 11 月 2 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1，第 30 頁；〈駐蘇使館致外交部電〉（1964 年 11 月 1 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1，第 27 頁；〈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日程〉（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 27 頁；〈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4 年 11 月 6 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1，第 35~36 頁。11 月 5 日到首都機場送行的人員同此計劃（《人民日報》1964 年 11 月 5 日，第 1 版）。

²² 〈日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土岐強同志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64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同志的文章〉，《人民日報》1964 年 11 月 3 日，第 4 版；〈瑞典共產黨主席赫爾曼遜同志的談話〉，《人民日報》1964 年 11 月 3 日，第 4 版；〈荷蘭共產黨主席格魯特同志的談話〉，《人民日報》1964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人民日報》11 月 2~4 日相繼發表了印尼、日本、波蘭、阿爾巴尼亞、新西蘭、摩洛哥、法國、瑞典、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英國、蒙古等 16 國共產黨、工人黨的表態材料。

²³ 〈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日程〉（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 27~29 頁。

中蘇兩黨正式會談前做最後的文章：一方面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蘇聯駐華大使館將於7日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招待會，擺出幾年來所不曾有過的友好姿態；²⁴ 一方面通過領導人的公開講話、黨報社論，表明中共的立場。

11月6日，北京隆重集會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中共中央委員、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副會長劉寧一宣讀了經過毛澤東審定並修改的講話稿，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重申中共的一貫立場，強調全世界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要集中一切力量來反對主要的敵人美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團結，必須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的基礎上。翌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審定並修改的社論重提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運總路線的建議，突出闡述中共提出的現階段國際共運的總路線，強調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要特別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當前國際共運的主要危險仍然是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提出，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在過去一段時期內遭到損害，不是由於中方和蘇聯人民的原因。同日，彭真在蘇聯駐華大使舉行的十月革命節招待會上發表講話則指出，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各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反不反對美帝國主義是要不要革命的分界線。²⁵

這些講話和文章，集中宣傳了中共的觀點，實際向蘇共發出了中

²⁴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54頁；《人民日報》1964年11月8日，第1版。

²⁵ 〈毛澤東對劉寧一在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18~219、216~217頁；《人民日報》1964年11月7日，第3版；《人民日報》1964年11月7日，第1版；《人民日報》1964年11月8日，第1版。

共原有立場不變的信息。至此，毛澤東“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調已渲染得淋漓盡致。這種基調實際沒有給周恩來留出任何調和的餘地，故而，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進行談判的方針也已明確無疑了。

2、蘇方做出將兩黨會談納入建設性軌道的準備。

蘇共中央解除赫魯曉夫的職務後，蘇共黨內對於蘇中關係的走向持有一種比較樂觀的估計，認為儘管蘇共在與中共爭論中的原則路線是正確的，但是赫魯曉夫的一些言論和舉動給兩黨兩國關係的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如他針對毛澤東所發的污辱性言論，匆忙決定將蘇聯專家從中國召回等等。而隨著赫魯曉夫離開領導崗位，類似的對蘇中關係產生相當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存在，這對於蘇共和中國領導人來說，都是好事。因此，中共領導人有可能會以更加務實的態度，充分利用蘇共中央十月全會所創造的客觀條件，來推動雙方關係的正常化。這樣的前提無疑是存在的。十月全會的決議將使中共可以不失體面地與蘇共接近。在蘇共領導人的心中，赫魯曉夫是蘇中關係緩和的最大障礙。一些緊跟蘇共走的東歐國家也認為，“只有在沒有赫魯曉夫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恢復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赫魯曉夫實際成了蘇共“重新同中國共產黨改善關係的犧牲品”。²⁶

與此同時，蘇共領導層中也存在著中共領袖有可能改變自己立場的幻想。蘇聯駐華使館官員阿·勃列日涅夫受命回國瞭解全會情況時即感受到，在莫斯科的權力長廊裡明顯地飄忽著必須採取主動措施來改善蘇中關係的思想。儘管誰都沒有直接地和公開地談論這一點，但

²⁶ 〈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關於與中共會談的發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ищ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важая попытк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ия. 1964~1965 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5, с.19~24；〈關於民主德國國內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月全體會議決議的反響〉（1964年10月17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271~273, 288~293。

是從交談者們向他提出的問題、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即興插話中，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這個結論。阿·勃列日涅夫認為，在蘇共領導人看來，既然蘇共和中共都是共產主義的政黨，那麼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礙這兩個黨的代表坐到一張桌子旁，坦誠地交談，並在某些問題上彼此做出讓步。假如需要，蘇共領導人可以為赫魯曉夫的粗魯道歉，進而與中共達成恢復友誼的協定。這在蘇聯方面的確不存在重大的問題，蘇中關係的改善不僅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而且還有利於新領導班子地位的鞏固，可以獲得全社會的廣泛支持。²⁷

只是，在蘇共新領導人忙於立足，尚未顧及向中共搖動橄欖枝時，中共中央搶先發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在樹立維護國際共運團結的形象上，搶得了先機。

1964年10月28日契爾沃年科與周恩來會見，獲悉中共派團赴蘇祝賀十月革命節並同蘇共領導人進行接觸的提議後當即表示，這次談話具有特殊意義，他將立即轉告莫斯科。²⁸ 其後，在向蘇共中央報告這次會見的情況時，契爾沃年科一面說明現在還沒有看到中共最高領導人有改變其總的政治路線的跡象，他們仍然強調自己的路線方針，包括關於國際共運的政策，目前也無跡象證實中國領導人在新的形勢下打算在召開兄弟黨會議問題上改變態度；一面通報中方自赫魯曉夫被解職以來所做出的對蘇友好姿態，建議蘇共中央充分利用這一新的局勢主動採取措施，表現蘇方想改善兩黨兩國關係的真誠願望，以此考察中國改善同蘇聯關係意圖的真誠性，及其

²⁷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4, с.861~862; Брежнев А.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с.89~91。

²⁸ 〈外交部、中聯部致潘自力大使電：告周總理同蘇駐華大使談話內容〉（1964年10月29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678-01，第5頁。

條件是什麼。²⁹

蘇共中央接到契爾沃年科的電報後，以積極的態度迅速做出了響應：10月29日委託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就中國方面的提議準備意見。同日由勃列日涅夫、米高揚、柯西金聯名復電中國領導人，對10月16日毛劉朱周所發的任職賀電表示感謝。³⁰ 10月30日，即做出邀請中國代表團參加十月革命慶典活動的決議，指示契爾沃年科回訪周恩來，以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名義向其通報：莫斯科將樂意接受中國黨政代表團來訪；莫斯科認為，中國代表團的來訪將有益於雙方的接觸和交流；蘇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觀點，即應當“循序漸進地改善蘇中關係”。建議對外公開報道中國代表團來參加十月革命47週年慶典的情況。蘇方已向12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出了邀請。與此同時，蘇共中央還向資本主義國家兄弟黨通報情況，指出蘇共中央討論了中國領導人的建議，認為蘇聯理應盡力利用這一建議來恢復蘇中雙方的聯繫，表示蘇共永遠準備利用一切可能在馬列主義、莫斯科歷次會議宣言和聲明的基礎上來鞏固國際共運的團結。³¹ 10月31日下午，契爾沃年科約見周恩來，表示“蘇聯方面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中國黨政代表團，並借此機會進行接觸，交換意見，以有利於中、蘇兩國朝著團結和一致的方向走，逐步解決存在的分歧”。蘇方並接受中方

²⁹ 〈契爾沃年科與周恩來會談紀要〉（1964年10月28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30~334。

³⁰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關於蘇聯駐中國大使於1964年10月29日來電做出的決議〉（1964年10月29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271~273、334；《人民日報》1964年11月2日，第1版。

³¹ 〈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邀請中國代表團參加十月革命慶典活動的決議〉（1964年10月30日），*Прокуменич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16~17；〈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通報中共中央建議的決議〉（1964年10月30日），*Прокуменич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15~16。

關於邀請社會主義國家黨政代表團的建議。³²

對於蘇共領導人說來，中共的建議及其友好姿態，令他們對即將舉行的蘇中兩黨會談寄予厚望，畢竟自大論戰開始後，兩黨的會談如同聾子對話，各自朗讀自己的長篇大論，各說各的，不做正面接觸。而赫魯曉夫的下臺，中共停止論戰並邁出尋求接觸的步伐，以及由態度調和並且務實的周恩來作為談判的首席代表，使得蘇中雙方可以面對面地直接進行交流，這無異於一個重大突破。因此，蘇共領導人極力希望將談判納入建設性的軌道，通過正面交流，將各自的觀點加以比較，清楚地表明各自對問題的理解，找出雙方分歧的癥結所在。³³盡力爭取取得良好的會談成果，奠定改善關係的基礎。為實現此目標，蘇共中央開始向中方傳遞信息，營造融洽的會談氛圍。

10月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就接待中國代表團問題指示蘇聯駐華使館說，其一，中國代表將參加的所有與十月革命47週年慶典有關的活動均應在友好和無拘無束的氣氛下進行。會談和招待會的組織工作都應給中國同志留下一個明確的印象，即我們已為與他們接觸和討論雙方都感興趣的問題做好了準備。如果中方在談話中涉及到蘇中關係等重要問題，你們在答復時應強調，我們黨現在和將來都準備為發展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我們期望中國黨政代表團的莫斯科之行將帶來積極成果。其二，在北京的十月革命47週年慶祝大會上發言時應指出蘇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堅定決心，強調蘇聯積極發展與中國兄弟般友誼和全面合作的強烈意願；發言應屬於一般政治性的，不要涉及有爭

³² 〈中聯部、外交部致潘自力電〉（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678-03，第20~22頁。

³³ 〈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關於與中共會談的發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ич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

議的問題。³⁴

兩天之後，契爾沃年科邀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去蘇聯使館釣魚、散步和野餐。其間，契爾沃年科高度評價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蘇聯進行訪問的重要意義，並就蘇中關係問題談了五點意見：1、蘇聯方面認為周恩來的這次訪問可以是兩國關係的轉折點。他個人認為，派遣像周恩來這樣瞭解蘇中關係全面和具體情況的領導同志前往蘇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2、儘管蘇中兩國和兩黨有分歧，但更重要的是，蘇中兩國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有共同的原則——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因此蘇中兩黨兩國是可以團結起來的。3、蘇中兩國之間的分歧不可能很快得到解決。但是重要的是蘇中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蘇中兩黨都是馬列主義政黨，總的原則都是一樣的，只是具體做法有區別。4、兩個國家和政黨正如兩個同志一樣，如果發生分歧，最好及時協商解決，積累起來，分歧成堆就不容易解決了。5、蘇方極其重視中方在總的方面和具體措施方面採取的步驟，蘇方也將採取同樣的態度和相應的步驟。蘇中兩國和兩黨肩負著極其重大的責任，因此它們之間的團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³⁵ 這種意見反映了蘇共領導人希望利用這一輪會談，更為理智、細緻地調和蘇中兩黨的分歧，在不放棄原則立場的前提下，務實地尋找共同點，求同存異，以達成新的和解。這是一種擱置爭議、具體而實際地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會談方針。

至於蘇共在會談中所要把握的底線，則仍然是堅持蘇共既有的路線綱領不變，準備召開新的國際會議。作為左派的印尼共產黨領袖艾地 10 月 24 日在就赫魯曉夫下臺問題發表講演時談到，蘇中的接近還

³⁴ 〈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如何接待中國代表團給駐華使館的指示〉（1964 年 10 月 31 日），*Прозуменич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18~19。

³⁵ 〈契爾沃年科與王炳南談話摘要〉（1964 年 11 月 3 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678-10，第 76~79 頁。

存在種種困難和障礙，因為蘇共還堅持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線。《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講話。這使蘇方意識到，此類認識可能是在提示蘇共，應該重新審視這些大會的決議。蘇共中央由此產生警惕，而進一步明確自己的談判立場，那就是，蘇共將堅定不移地遵照蘇共近期歷次代表大會決議、綱領和莫斯科會議諸文件所確定的方針行事，蘇共在原則問題上絕不做任何讓步。10月26日和27日勃列日涅夫等人與法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馬歇等人會談時，則否認了關於蘇共將設法同中共領導人在意識形態方面妥協的傳聞，聲明蘇共舉行兄弟黨會議的建議依舊有效。³⁶ 其後，勃列日涅夫11月6日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大會上的報告中重申蘇共的立場，繼續強調蘇共近幾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黨的綱領所確定的蘇聯對外政策總方針是始終一貫的、不變的和惟一正確的，它受到蘇聯和世界極大多數人民的完全贊同。明確提出，再次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必要性顯然已經成熟。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也在北京的慶祝集會上引述了蘇共中央的這種立場。³⁷

另外，蘇中關係畢竟裂痕已深，乍暖還寒，蘇共對中共的信任也尚未恢復。因此，在積極回應中共提議的同時，同中共要把這次會談當作“火力偵察”，考察蘇共捍衛原則立場的堅定性相同，蘇共則是想弄清中共的真實意圖，考量其希望改善關係的真誠度如何。於是，與過去周恩來訪蘇時由赫魯曉夫率大部或全體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迎送相比較，對中國黨政代表團的接待，表面上維持一般禮遇，實際上則比較冷淡。當周恩來一行在新西伯利亞機場中轉時，蘇共中央僅

³⁶ 《人民日報》1964年11月2日，第3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關於與中共會談的發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кумениц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19~24；《人民日報》1964年11月4日，第4版；《內部參考》第3674號1964年11月13日，第31頁。

³⁷ 《人民日報》1964年11月8日，第3版；《人民日報》1964年11月7日，第1版。

派一名聯絡員前往迎接，在莫斯科機場恭迎的領導人也只有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主席團委員基里連科等，場上沒有儀仗隊，也沒有群眾歡迎的場面；東歐國家和蒙古的黨集體不到機場迎接；在有關蘇聯領導人接見兄弟黨國家代表團的報道中，對接見氣氛一般都冠以“友好和親切”的字樣，而對接見中國代表團的報道卻只提“友好”，略去“親切”一詞；在周恩來向列寧墓獻花圈時，只有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陪同；雖然遊行隊伍中出現的畫有社會主義國家國旗的標語牌上，蘇、中國旗排在首位和次位，其他國家的以字母排列，顯示了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但是慶典觀禮位置的安排和兄弟黨代表團唱名及報刊報道時的排名，均按平等原則處理，不再突出中國。³⁸

與此同時，一直以維護國際共運團結主導力量自居的蘇共中央，面對中共儼然以共運領袖的身份和以我為主的姿態建議其他兄弟黨赴莫斯科參加慶典，以及廣泛通知各國駐蘇使節前往伏努科夫機場迎接中國代表團的舉措，也採取了相應措施，設法限制中國的影響。如不安排周恩來抵達莫斯科後在機場發表講話；慶祝會上原說提供講話機會，後又取消；對《人民日報》11月7日社論〈在偉大的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和彭真是日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十月革命節招待會上的講話不做任何反應。³⁹ 如此等等，表明了蘇方的一種提防態

³⁸ 〈駐蘇使館致外交部電〉（1964年11月4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1，第33~34頁；《新情況》第178號，1964年11月13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2，第107~108頁；〈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4年11月6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1，第35~36頁；〈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總參二部電〉（1964年11月7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2，第105頁。觀禮位置周恩來被安排在波蘭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和東德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之後。

³⁹ 〈駐蘇使館致外交部電〉（1964年11月4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1，第33頁；《新情況》第178號1964年11月13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2，第108頁；《人民日報》1964年11月7日，第1版。

度，既不願意讓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的機場內造聲勢，宣傳中共的觀點，擺出率先呼籲團結的姿態，使蘇共處於被動；又擔心中方的演講會引出意識形態爭論的議題，令蘇方難以應對，陷入兩難境地，進而影響剛剛出現的尋求團結的良好氛圍。用心可謂良苦。

總之，11月初，中蘇雙方利用紀念十月革命節之機所發表的講話、文章等等，已繼續呈現出各說各的，觀點針尖對麥芒的狀態。中蘇兩黨關於會談的底線，特別是毛澤東“推”字方針造成的中攻蘇守的態勢，實際已經預示了兩黨會談無果而終的前景。

三、1964年11月周恩來訪蘇中的風波

1964年11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評估勃列日涅夫11月6日在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大會上的報告。毛澤東評判蘇共新領導是虛弱、膽怯的，對一些重大問題不敢採取鮮明的態度，不敢同赫魯曉夫劃清界線，也不敢公開宣佈按原定計劃於12月15日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籌備會。指出，看來蘇共領導還沒有明確下一步該怎麼做，甚至在主席團內部，也沒有形成一個有綱領、有步驟和方法的意見。⁴⁰由此，對周恩來在莫斯科“推”蘇共領導集團轉向還抱有希望。這時，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酒後失言”事件，葬送了中蘇雙方所刻意營造的緩和氛圍，並為中國代表團提供了施加壓力的炮彈。周恩來在正式會談時亮出了中共否定蘇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路線綱領的牌，矛頭直指蘇共的內部事務。如果說蘇共領導人此前確如毛澤東等人所評估的那樣還處於猶豫、模稜狀態的話，那麼這時的蘇共領導集團就要為維護自尊和主權而戰了。中蘇兩黨實現和解的前提條件都沒有變化，仍然是繼

⁴⁰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56~860頁。

續維護自己立場的正確性，要求對方做出原則性讓步。尤其是中共，擺出毫無調和餘地的架勢，既未改變自己好鬥的本性，也沒有放棄奪取國際共運旗手、世界革命領袖之位的訴求；而蘇共方面，儘管認為自己在新形勢下處理與中共關係時應該更加成熟，但其前提也是要盡一切可能加強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態勢迅速明朗化，中蘇實現新的團結，以及國際共運的團結，實際已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

1、授中共以柄的馬利諾夫斯基事件

莫斯科時間 11 月 7 日下午 4 點至 6 點半，中國黨政代表團出席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舉行的招待會。席間，馬利諾夫斯基喝多了酒，說了一句帶有挑釁性的反美祝酒詞，得罪了美國駐蘇大使。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走向馬利諾夫斯基，為他“精彩的反帝祝酒詞”表示祝賀。⁴¹ 不想這位元帥又借著酒勁兒對周恩來說，希望中國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術”，“我們不要讓任何鬼來擾亂我們的關係”。“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任何毛澤東，不要任何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的關係”！由於美國記者就在旁邊聆聽兩人的談話，周恩來忍受了這種挑釁性的話題，走向另一邊。這時其他的一些蘇聯元帥走了過來，中方翻譯聽到了馬利諾夫斯基繼續說的話：“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接著他又同賀龍談話。馬利諾夫斯基在談到毛澤東時使用了俄文中帶有污辱性的髒話“胡造”一詞，這個詞的俄文原意是“狗操的”。其間，蘇聯元帥扎哈羅夫還說了一句：“任何蔬菜都是有時令的”。⁴²

⁴¹ 〈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日程〉（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 29 頁；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 1998 年，第 148~149 頁。

⁴²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 259 頁；〈中蘇兩黨會談記錄〉

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人聽說此情後極為氣憤，當即離開了宴會大廳。回到中國駐蘇使館後，周恩來認真聽取了幾位翻譯的彙報，仔細核實和分析了馬利諾夫斯基挑釁的全部情況。考慮到蘇聯顛覆兄弟黨的歷史記錄，代表團認為，這決非偶然事件，是令中國黨、國家、人民及其領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動要推翻中國黨和國家的領袖，必須嚴肅對待。11月7日夜，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團發來的急電，報告此事的經過，並提出代表團準備向蘇共中央正式抗議，請中央儘快給予指示。⁴³

11月8日上午，毛澤東在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中國代表團的電報時說，現在好了，他們有辮子在我們手裡了。我們可以抓住此事採取攻勢，不要把這個事情攔到以後再說，並指示鄧小平起草復電：同意代表團代表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提出正式的嚴重抗議，要求蘇共中央做出正式答復；要抓住此事件採取攻勢，指責蘇共新領導破壞團結，繼續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不怕大吵大鬧、鬧僵不歡而散；堅持中共原來的立場，除非蘇共承認錯誤或經過協商取得協議，中共才能停止公開論戰。即之以特急電發給中國代表團。⁴⁴顯然，毛澤東要充分利用此事件做文章，使之成為向蘇方施加壓力，推動蘇共改弦更張，向中國方針靠攏的砝碼。

中國代表團接到復電時，正值蘇共領導人到中國代表團的住所回拜並共進午餐，周恩來即借機正式就此事件向蘇方提出了抗議。周特

(1964年11月8日)，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85~1786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勃夫、葛羅米柯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代表團的會談記錄〉（1964年11月8日），*Арм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48~356；2007年9月24日李丹慧採訪閻明復記錄。

⁴³ 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第23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62頁。

⁴⁴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62~865頁。

別強調說，這不僅僅是馬利諾夫斯基一個人的問題，不是他一個人具有這種想法，而是蘇共中央委員會一些人的想法。詰問蘇方是否希望中共也像蘇共解除赫魯曉夫職務那樣對待毛澤東？！指責蘇聯元帥關於“任何蔬菜都有時令”的話可以理解為是教唆撤換毛澤東。正告蘇共領導人：如果有人制定了這樣的計劃，那麼這是徒勞無益的企圖和妄想！它只能惡化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同時提示蘇方，不要像帝國主義者那樣，把中蘇兩黨之間的原則分歧歸結為是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兩個領導人之間個人的爭論，以及他們的個人性格和素質。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否則中蘇雙方還能繼續會談什麼呢？⁴⁵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立即擺出息事寧人的態度，一方面對馬利諾夫斯基的言論表示憤慨和道歉，一方面反復加以表白和澄清，指出，蘇共中央把中國派代表團訪蘇看作是克服現有分歧、改善雙方關係所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馬利諾夫斯基不是主席團成員或候補成員，他沒有參加關於蘇中兩黨接觸的討論；正式聲明馬利諾夫斯基的言論與蘇共中央沒有任何關係，只是酒後失言。而“時令蔬菜”的話也只是針對赫魯曉夫而發；一再表示蘇共邀請中共代表團的決定是坦誠的，動機是非常好的，希望中共能夠信任和尊重蘇共領導人的意見，雙方能夠以誠相見，不要為此事妨礙兩黨為改善關係所共同做出的努力。周恩來則說馬利諾夫斯基實際是酒後吐真言，他保留中國代表團以後再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權力。⁴⁶

⁴⁵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勃夫、葛羅米柯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代表團的會談記錄〉（1964年11月8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48~356。

⁴⁶ 〈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30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勃夫、葛羅米柯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代表團的會談記錄〉（1964年11月8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48~356。

此時，儘管周恩來最後表態要認真對待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意見，並提議為中蘇兩黨的團結乾杯，⁴⁷ 試圖為接下來的正式會談留下一些輾轉騰挪的餘地，但是，由於毛澤東已經給蘇共新領導人扣上了“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的帽子，確定要抓住這個“辮子”，不惜鬧僵地採取攻勢，周恩來其實已沒有什麼再做彌合、補救的機會了。

2、沒有調和餘地的兩黨會談

11月9日晚，中國代表團在克里姆林宮與蘇共領導人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談。周恩來一開始即利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向蘇方施加壓力，勸告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要把赫魯曉夫這個包袱接過來，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張，另起爐灶，重新搞起，這樣，雙方才能找到一些共同點。宣稱不存在改善關係的新的條件，因為蘇共繼續實行以前的總路線。蘇聯共產黨的總路線是不能與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相提並論的。⁴⁸ 這種頤指氣使地干涉蘇共內部事務的表現，一時激怒了蘇共領導人，他們態度強硬地表示，蘇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線和蘇共綱領並非某個人的一己之見，而是反映了蘇共全黨的意願，代表著蘇聯全體人民的意志。提請中方注意：此次會談的重點不是重新討論中共的總路線問題，雖然對於中共路線中的很多問題蘇共也並不贊成。聲明：如果每個來蘇聯訪問的代表團都要求重新討論黨的總路線，那麼談判就會走入死胡同。為了共同的事業和利益，蘇中雙方都應該向

⁴⁷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勃夫、葛羅米柯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代表團的會談記錄〉（1964年11月8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48~356。

⁴⁸ 〈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27~34頁；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61頁；〈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關於與中共會談的發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ищikov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19~24。

前看，而不是向後看。強調：蘇共中央將堅定不移地執行蘇共二十大以來所確定的路線綱領，在原則問題上絕不做任何退讓。米高揚甚至明確表態說：“我們黨過去和現在都是由集體領導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問題上，我們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沒有分歧，甚至沒有細緻的差別。”蘇方堅持要求雙方先停止公開爭論，召開各國黨的會議，在新的氣氛中，尋求途徑，來一步一步地實現共同願望。⁴⁹

蘇共領導人顯然還沒有弄明白，中共要求重新審視路線問題，就是要在“推”的過程中，摸清蘇方讓步的底線。而雙方在舉行國際會議問題上的膠著，則反映了兩黨對於國際共運形勢的估計。對於蘇共而言，情況與赫魯曉夫在位時的判斷相同，中共要求推遲召開兄弟黨會議，是為了拉攏並增加自己的支持者；而在中共看來，蘇共繼續堅持開會，就是要在新的形勢下對中共採取集體措施，通過反華決議。⁵⁰毛澤東決不可能令自己和中共陷入這種被動局面。

由此，在11月11日兩黨長達六個多小時的第二次會談中，周恩來明確通報了中方的立場：一、中國繼續堅持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賀電的精神和周恩來在11月7日慶祝大會書面祝詞中表達的團結願望。二、中國堅決不參加將在12月召開的所謂“起草委員會籌備會議”。三、在蘇繼續執行赫魯曉夫路線不變，中蘇兩黨、兄弟黨的原則性分歧基本解決以前，談不到停止公開爭論。他並以最後通牒的口吻奉勸蘇共領導人懸崖勒馬，不要走絕路；關於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同蘇聯領導人的幾次談話，不發表任何聯合聲明或聯合公

⁴⁹ 〈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關於與中共會談的發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куменищ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19~24；〈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未經修正的速記記錄〉（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62~419；〈米高揚在中蘇兩黨會談的發言記錄〉（1964年11月9日），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786~1787頁。

⁵⁰ 《人民日報》1964年7月31日，第2版；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85頁。

報，也不發表新聞。⁵¹

11月12日，中蘇雙方舉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談。為了打破僵局，勃列日涅夫提出，蘇共中央建議只要中國方面準備好，就可以舉行兩國高級會談，以便就一系列問題交換意見，一步一步向前邁進，恢復蘇共和中共、蘇聯和中國之間的信任，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周恩來表示將報告中共中央，並針對蘇方的建議指出，我們的門是開著的。中蘇兩國都必須努力創造新的環境，尋找新的途徑。⁵² 態度有所鬆動。

只是，根據蘇聯方面的記載，中國代表團千方百計地迴避就蘇方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進行討論，迴避探討鞏固反帝統一戰線的具體措施。當蘇方要求中國代表就中止論戰等具體建議表態時，周恩來正式聲明說，代表團沒有同蘇共談判的全權，其使命“就是建立聯繫並研究局勢”。⁵³ 因此，周恩來態度的緩和，對於中蘇關係的改善意義不大。

事實也正是如此，毛澤東在北京遙控著中國代表團的各種反應，周恩來本人沒有什麼個人發揮的空間。毛的採取攻勢的“推”的方針，使得談判進程只能在非理性的政治論戰的層面徘徊，而難於進入

⁵¹〈中蘇兩黨會談記錄〉(1964年11月11日)，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786~1787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74~877頁。關於第二次會談的時長，中蘇雙方的記錄有差異，中方為17:00~23:20，共6小時20分鐘；蘇方記述為七個小時以上(〈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32頁；〈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未經修正的速記記錄(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62~419*)。

⁵² 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第29頁；〈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未經修正的速記記錄〉(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62~419*。

⁵³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未經修正的速記記錄〉(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62~419*。

理智並務實地尋找共同點，解決具體問題的階段。中國代表團關於重新討論並改變作為國際共運總路線的蘇共綱領的要求，以及拒不考慮召開兄弟黨會議的態度，使談判無果而終。其實在這裡，無結果或許就是毛澤東所要尋求的結果，即如後來他自己所說的，“試探是必要的，沒有達成什麼協議是不奇怪的，有一點收穫也就夠了”。⁵⁴ 畢竟毛的部分目標已經達到，既試探出了莫斯科恢復蘇中關係的底線，摸清了蘇共領導人捍衛自己原則的進退尺度；又向世人呈現出了主動維護國際共運團結的風貌，並且通過代表團在莫斯科與其他黨的交談，繼續闡釋赫魯曉夫在職時做出的舉行兄弟黨會議的決定未經各黨協商一致，因而是非法的，⁵⁵ 以此拆籌備此會議的蘇共新領導人的臺，同時將其推上了分裂共產主義運動的審判臺。

3、回歸政治論戰軌道

11月13日，中國外交部擬訂了歡迎中國黨政代表團回國的計劃，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先念等黨政領導人前往機場迎接。莫斯科時間13日晚10時，中國代表團乘中國專機回國，柯西金、基里連科等人到機場送行。北京時間14日下午2點40分，周恩來一行抵達首都機場，看到的是毛澤東親自在那裡迎候，劉少奇等黨政軍民各界領導人一百餘人，以及數千名群眾到場迎接，其場面和氣氛與一年多以前（1963年7月）中共代表團與蘇共會談歸來時十分相似。這實際上依然是一次顯示中共團結和力量的政治示威。《人民日報》發表的中蘇兩黨舉行會見的消息，除報道雙方參加會見的人

⁵⁴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83頁。

⁵⁵ 〈中波兩黨會談記錄〉（1964年11月9日），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786~1787頁。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期間，與多個兄弟黨代表團舉行了會談，有的會談長達三個小時（如與羅馬尼亞）（〈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節活動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28~33頁）。

員外，無任何實質性內容，標誌了兩黨談判的破裂。⁵⁶ 毛澤東以這種方式，宣示了他與蘇共決裂的決心。

與此同時，11月14日，中國代表團剛離開莫斯科不久，由蘇共中央委員魯米揚采夫主編的《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1964年第11月號即開始發行，上面以〈共產黨報刊關於共產黨國際會議〉為題，發表了22個黨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主張召開國際會議的言論，並刊載了大量指名攻擊中共的文章、講話等材料，其中蘇共中央書記安德羅波夫的文章指出：“如果不是中共領導進行分裂活動，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企圖恢復被各國黨摒棄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的老方法，那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方針會產生更大的結果”。該期雜誌還以附頁的形式登載了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貝爾納反對中國第一次核試驗的聲明，指責這次核試驗是“污染大氣”等等。⁵⁷ 蘇共領導集團借這一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聯合刊物⁵⁸的陣地，宣告了蘇中兩黨此次緩和關係嘗試的失敗。

周恩來落地伊始，即隨毛澤東前往人民大會堂118會議室晤談。毛在進一步詢問情況後部署說，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和它的籌備會議要封死，就是反對召開，拒絕參加，堅決抵制，召開了我們還要加以

⁵⁶ 〈外交部關於歡迎周總理率領的訪蘇黨政代表團回國計劃的請示〉（1964年11月13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4-05，第17~18頁；《人民日報》1964年11月14日，第1版，1964年11月15日，第1版；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81頁。

⁵⁷ 《人民日報》1964年11月21日，第3版；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資料室編：《蘇聯大事記（1964~1966）》，1975年，未刊，第19~20頁。

⁵⁸ 《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為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聯合主辦的國際性理論月刊，於1958年8月在布拉格正式出版。1962年11月，作為反修鬥爭的重大步驟，中共中央斷絕了與該雜誌的關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97~98頁；〈中央關於我黨同“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斷絕關係問題的通知（1962年11月27日）〉，長春市檔案館，1/1-15/38，第62~63頁）。

譴責。停止公開論戰也要封死。我們不受任何約束，繼續公開論戰，這個原則絕不讓步。公開論戰一定要抓住蘇共新領導新的錯誤，我們要積累資本，採取後發制人的方針，但是可以轉載兄弟黨評論赫魯曉夫錯誤的材料。並指示撰寫評述赫魯曉夫下臺的文章，說明赫魯曉夫路線的破產。對於赫魯曉夫的垮臺和蘇共新領導人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的趨向，毛以宋代詞人晏殊的詞句做了總結：“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⁵⁹

蘇共中央則於11月16日舉行全體會議，一方面在對領導集團進行調整時，不僅全部保留赫魯曉夫的原班人馬，而且補選上來的人，也都是赫魯曉夫路線的積極擁護者，並且是在赫當政時提拔到高級領導崗位上的，⁶⁰ 以此顯示蘇共原定路線的不可動搖性。一方面緩和對中共的態度，由勃列日涅夫在特別通報與中國黨政代表團的談判情況時提出：今後在同中國，無論是黨的接觸還是國家的接觸方面都要採取靈活的政策；如果中國同志加劇了論戰，我們將對他們進行堅定、沉著的回應，但不會謾罵；同時我們今後將更加堅定地堅持我們黨的原則立場，絕不允許放棄；在相關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仍會繼續進行爭論；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與中國人民的友好關係，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這就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加強自己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蘇共需要的已不再是好鬥，而是成熟、審時度勢和智慧。⁶¹ 對與中共論爭的節奏

⁵⁹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878~883頁。

⁶⁰ 〈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4年11月17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2，第112~114頁；〈外事調研專字第9號〉（1964年12月29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295-03，第90頁。

⁶¹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未經修正的速記記錄〉（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62~419*；〈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關於與中共會談的發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куменичиков М.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19~24*。

做出了新的部署。

但是，中國方面的回應開始了。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第21、22期合刊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列舉赫魯曉夫所做的12件壞事，證實其下臺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大破產，大失敗，⁶²由此吹響了與蘇共進行新一輪公開論戰的號角。《人民日報》自此開始，陸續轉載兄弟黨評述赫魯曉夫下臺、批判現代修正主義、質疑舉行國際會議的文章、講話等等。作為反噬，《真理報》於12月6日發表編輯部文章〈全民的國家〉，影射中共批判“全民國家”是為了維護“個人迷信”，蘇中兩黨的爭論具有國際意義，蘇聯絕不回到斯大林時期。⁶³中蘇之間持續了一個多月之久的休戰結束了，兩黨關係開始重蹈覆轍，回歸政治論戰的格局。

11月24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將原定12月15日舉行的26黨起草委員會推遲到1965年3月1日舉行，通報說“主張召集起草委員會的兄弟黨有權進行”會議的“實際準備工作”，起草委員會可以“起草主要文件的草稿”。⁶⁴這封信由契爾沃年科於11月27日下午轉交外交部副部長劉曉，不啻向中共送上了最後通牒。針對契爾沃年科關於舉行會議不是蘇共中央堅持，而是蘇共中央在同兄弟黨協商後表達他們意見的說法，劉曉和參加會見的中聯部副部長王力以論戰的激情予以駁斥，指責蘇共新領導繼續強加於人，繼承了赫魯曉夫分裂主義的政策。⁶⁵毛澤東則在翌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表態說，他們要開就開，讓他們去開，我們正盼他們開，讓他們掉

⁶² 《人民日報》1964年11月21日，第1版。

⁶³ 《內部參考》第3684號1964年12月8日，第24~26頁。

⁶⁴ 周文琪、褚良如編：《特殊而複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編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3頁。

⁶⁵ 〈劉曉接見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4年11月27日），外交部檔案館，102-00142-03，第12~17頁。

到深淵，自掘墳墓。⁶⁶

周恩來率團莫斯科之行的風風雨雨，突出顯示了一個客觀實事，即，如果說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確實還屬於個人行為的話，那麼，中共對蘇共新領導人改變方針政策的要求，則是中共中央對他黨內政進行干預的集體行為。前者給毛澤東投下了鉅大的心理陰影，後者則使中共代表團完成了出使蘇聯的試探任務。在中國方面來說，與蘇共決裂已成定局。國際共運正式分裂的景象就在眼前了。

四、結論：失去的機遇？

中蘇兩黨和解之夢難圓的癥結所在，還要追溯至中共在兩次莫斯科會議上所做的實質性讓步。1956年末1957年初，由於中共幫助赫魯曉夫和蘇共成功化解了波匈事件引起的危機，毛澤東和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上昇到基本與蘇共平起平坐的位置，中共向國際共運旗手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意氣風發的毛澤東在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議上，為了照顧赫魯曉夫和蘇共的困難，⁶⁷ 做出妥協，贊成在會議形成的國際文件《宣言》中全面肯定一個黨的代表大會——蘇共二十大，既而在事實上接受了蘇共對內對外綱領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認了蘇共二十大的綱領路線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應該遵循的共同準則。會議最終的成果是推出了一個以蘇聯的方針政策，也即以赫魯曉夫的指導思想為基礎的共同綱領，令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毛澤東如芒在背，如鯁在喉。

隨著1958~1959年中蘇兩黨在對外和對內政策方面分歧的產生

⁶⁶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910頁。

⁶⁷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復信稿的批語和修改（1964年7月15日、20日、2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105~109頁。

與發展，國際共運以誰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為統一的標準、共同的規律，以誰為領袖的問題，愈益突出起來。意識形態的分歧已與兩黨的政治命運、兩黨領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聯繫到了一起。但是中國國內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使得毛澤東不得不在 1960 年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上繼續讓步，再次同意於會議形成的共同文件《聲明》中高度肯定蘇共二十大，從而實質上重申了蘇共方針政策對國際共運的指導意義，鞏固了蘇共綱領作為國際共運共同準則的地位。《聲明》的核心貫穿的仍然是赫魯曉夫的思想體系，而其特別強調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精神”，主旨在於突出社會主義陣營利益與各國民族利益的統一性，以及陣營利益高於民族利益、黨際關係重於國家關係的內涵，為重新塑造蘇共是國際共運領導者、莫斯科是國際共運中心的形象鋪平了道路。

在中蘇兩黨愈益激烈的爭執中，這種實質性讓步對中共造成的羈絆越來越明顯：一方面使得中共在反對蘇共的國際共運總路線時，同時也陷入了反對蘇共本黨的方針政策、干涉他黨內部事務的兩難處境；一方面將實施論戰的中共推到了國際共運大多數黨的對立面，使毛澤東及中共陷入到了無視大多數黨的意見，以少數否決多數，以“反潮流精神”置國際共運團結於不顧的尷尬境地；一方面又使中共和毛沉入一種無法擺脫的螺旋，要想求得團結，就須擱置爭執，其結果是接受蘇共的國際共運綱領路線，由此也就失去了爭得共運領導權的資本，容忍共運沿著中共認為的錯誤路線走下去。所以，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共對國際共運旗手地位的追求，如何克服此羈絆變得越來越迫切了。毛澤東要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被動局面，就須要求蘇共重新審視並否定二十大，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實現，那麼以蘇共綱領為本的國際共運總路線也就自然退出歷史舞臺，其不僅為將國際共運納入中共認為的正確軌道提供了前提，而且也為中蘇兩黨達成

新的團結掃清了障礙。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的下臺，似乎為毛澤東的上述設想提供了機遇。但是，如果說此時出現了中蘇兩黨和解的機會，還需要具備以下兩個基本條件：

其一，雙方具有做出實質性讓步的基礎，特別是促使倡導鬥爭哲學的毛澤東讓步的基礎還依然存在。

對於中共而言，導致1960~1961年中蘇關係實現緩和的那種國內條件和國際共運環境已不復存在。一是到1964年時，中國的經濟狀況已完全好轉，中共無須因需要解決國內人民的生活問題而不得不權衡利弊，對蘇聯採取讓步方針。二是公開大論戰使國際共運的裂痕加深，左派隊伍繼續壯大，大部分共產黨、工人黨中都分化出了左派小組。許多左派兄弟黨以及兄弟黨中的左派小組，或積極評價赫魯曉夫的下臺，或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或號召加強反修鬥爭，改變各黨修正主義的領導。⁶⁸ 中共推舉毛澤東擔當共運旗手的意識進一步膨脹。如此等等，使毛澤東已無必要和可能再對蘇共做出讓步。

對於蘇共來說，一方面，新領導人執政伊始，地位並不穩固。截至11月中旬，除俄羅斯等五個加盟共和國表示支持蘇共中央十月全會，其他加盟共和國報紙均未做直接表態；雖然有一些加盟共和國發表社論，對蘇共中央新任領導表示支持，但是也有加盟共和國的報紙只提人民一心一意地相信黨，而不提信任中央。⁶⁹ 一方面，新領導集團堅持原有路線的方針，獲得了大部分州、市黨員的擁護；幾乎所有加盟共和國發表的紀念十月革命節的社論，都提到了二十大、二十

⁶⁸ 《內部參考》第3681號1964年12月1日，第25~32頁；1963~1964年《人民日報》發表的相關文章和報道。

⁶⁹ 〈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4年11月12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2，第124~125頁。

一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列寧主義總路線。⁷⁰ 這種狀況表明，在蘇共黨內、蘇聯國內，地方與中央存在有矛盾的跡象；同時也表明，在黨內、國內，尚不存在否定蘇共二十大的基礎。其使得蘇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評價赫魯曉夫的路線綱領問題上，輕舉妄動。

其二，中蘇雙方都有做出讓步的打算和誠意，談判立場存在調和的餘地。

就中共言之，一方面，考慮到中共自身在國際共運中的發展，毛澤東已決心清除當年起草《宣言》和《聲明》時做出妥協所造成的遺患；一方面，毛澤東對中共黨內政治形勢的估計越來越嚴峻，認為中央有出修正主義的可能。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已通過與蘇共的大論戰而初步形成，一場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醞釀之中。為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靶子不能倒。所以毛澤東必須要求蘇共新領導人與赫魯曉夫決裂，否則中蘇兩黨不可能實現新的團結。儘管10月16日伍修權在聽取契爾沃年科關於赫魯曉夫下臺的通報時，針對蘇共中央通知中所說的蘇共將繼續執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決議和蘇共綱領的話表示，“這是蘇共內部的事情，我們沒有意見”，⁷¹ 反映了中共最初不干涉他黨內政的態度，但是毛澤東其後定下的“推”蘇共丟掉赫魯曉夫包袱的談判立場，卻是要顛覆蘇共的內政，其間沒有退讓的底線，故也不是真正尋求和解的方針。毛澤東此時採用了他曾深惡痛絕的斯大林、赫魯曉夫干涉他黨內政的做

⁷⁰〈莫斯科市委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報〉（1964年10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271~273；〈羅斯托夫州工農業黨組織積極分子討論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月（1964年）全體會議決議的會議速記記錄〉（1964年10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273~280；〈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4年11月12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2，第124頁。

⁷¹〈伍修權接見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4年10月16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08-03，第2頁。

法，其實是由其局限性所決定的，即他仍然在國際共運傳統的框架內思考問題，要求一致性，即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應該統一執行中共的路線方針，這是國際共運要發展所能走的惟一正確的道路；依舊將黨際關係混同於國家關係，中蘇兩黨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如果蘇共不做出實質性讓步，接受中共的原則立場，中共就不能再與之求同存異，發展國家關係。而一次偶然事件——馬利諾夫斯基的酒後失言，無疑進一步刺激了毛澤東，由此更堅定了中共談判立場的不可調和性。

對於即將來臨的蘇中兩黨新一輪會談，蘇共中央原本充滿希望，儘管蘇共新領導人並不打算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但是其準備務實地討論具體問題，尋找共同點的設想，還是為兩黨關係的改善留出了讓步的空間。而中國代表團的要求，不僅令蘇共中央完全不可能接受，而且還激發了他們自衛的熱情，使之態度和立場轉向強硬，擺出了不放棄蘇共原則立場的強勢姿態。畢竟蘇共中央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尤其不能否定為兩次莫斯科會議所肯定的二十大，不能將共運領袖的地位拱手相讓。

中蘇雙方，特別是中國，已不可能再務實地追求具體的共同利益，求同存異。1960~1961年那種“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迴避意識形態鬥爭的情況下實現緩和”⁷²的條件實際已經不復存在。上述兩個基本條件的變化，導致赫魯曉夫下臺後，中蘇其實已經沒有重新和好的基礎，所以說也就無所謂機遇的失去。

中蘇兩黨1964年11月的這次會談破裂後，中共實際徹底放棄了再與蘇共言和的努力，中國對蘇方針、部署的原則轉向在與蘇聯的國家關係上採取高姿態，高舉發展兩國關係的旗幟，至於黨際關係，依

⁷² 牛軍：〈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580頁。

舊是要不斷揭露和批判蘇共新領導集團。⁷³ 毛澤東著手另起爐灶，一方面率領國際共運中分裂出來的左派黨，繼續開展世界革命運動；一方面積極爭取中間地帶國家，以第三世界領袖的姿態，領導亞非拉美地區的反帝、反殖鬥爭。由此，1965年初美國昇級越戰後，面對蘇聯加強軍事援助河內的反帝鬥爭新局面，中共仍然無意在共同的反帝大業中與蘇共修好。隨著世界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三月會晤的結束，毛澤東在將國際共運分裂的責任正式歸咎於蘇共後，與莫斯科分道揚鑣了。這時中國的外交路線進一步向極左方向調整，強調對外總路線的內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平等合作。⁷⁴ 反帝和支援世界革命成為中國外交的中心目標。幾個月後，《人民日報》發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提出：“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共產主義責任。”⁷⁵ 至此，中國的與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似乎已成為了一種權宜之計，一個策略。中共以世界革命領導核心的身份，啟動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新階段。

這種發展脈絡，實際為赫魯曉夫下臺後毛澤東尋求與蘇共和解的真實意圖，做了補充詮釋。

⁷³ 〈外交部對中蘇兩國間未了案件的處理意見〉（1964年12月9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2715-01，第15頁。

⁷⁴ 〈劉少奇、鄧小平和康生接見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5年4月21日），外交部檔案館，109-03974-07，第69~70頁。

⁷⁵ 《人民日報》1965年9月3日，第1版。